

# 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控制的实态

## ——基于通县新民会的考察

刘 洁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华北日伪当局成立新民会,以加强社会控制、辅佐伪政府施政。通县位于北京近郊,是日伪当局树立的治安模范县,也是新民会的模范区。通县新民会协助伪政府进行组织控制、思想控制、民意控制、乡村控制,建立了一套从内到外、横跨城乡的社会控制体系。然而,新民会对于通县的控制并不成功。通县作为日伪当局的模范县,尚且如此,整个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基层社会控制效果当不容高估。

**关键词** 新民会 华北沦陷区 社会控制 通县

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地区迅速沦陷。面对动荡不安的华北基层社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无力建立稳定的统治。日本认为,“鉴于新政权不可能把民众诱导到亲日满,所以要结成与政府表里一体的民众团体”。<sup>①</sup>于是,新民会应运而生。作为伪政府的辅佐机构,新民会“立于政府与民众之中间”的姿态<sup>②</sup>,及其民众团体的外衣,使其成为协助伪政府维持社会秩序、加强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为了将控制触角深入华北城乡,华北日伪当局成立了与各级行政机关平行的新民会组织,从而形成了“府会一体,政教一致”的双轨政制。<sup>③</sup>这样,伪政府隐身于后,新民会活跃于前,推行“政治的”社会控制。<sup>④</sup>

通县位于北京以东45里处,从北京经平通铁路不到1小时即到通县。《塘沽协定》签订后,通县被划入冀东非武装区,从此“成为一个受制于日本的特殊地区”。<sup>⑤</sup>1935年底,通县成为伪冀东

① 成田贡:《中华民国新民会大观》,公益社1940年版,第57页,转引自王强《汉奸组织新民会》,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② 《新民会今日成立》,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6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页。

③ 王菊隐:《新民会扩大组织——坚持特殊性与民众同进》,《新民报半月刊》第二卷第七号,1940年4月1日,第4页。

④ 罗斯在《社会控制》一书将社会控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伦理的控制工具,即社会自发形成的自然秩序。另一种控制类型是政治的控制,即由国家权力推行的控制,一般被用作政策的工具。见E. A. 罗斯著,秦志勇译:《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页。本文所涉及的“社会控制”的概念取“政治的”意义,即由国家权力主导的政治控制。

⑤ 张振鹗:《前言》,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1938年初,日本认为冀东地区“治安、及其他一般情势,均略具相当准备,亟应组织新民会之模范区域”。<sup>①</sup>在此背景下,新民会通县指导部于1938年6月成立。该年11月,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正式议定“将大兴、宛平、通县、首都四郊建成模范区”。<sup>②</sup>从此,通县成为新民会中央大力打造的模范县。与此同时,伪政府认为“首都乃全国首善之区,万国观瞻所系……是以近郊之治安,应有更行强化之必要”,故“拟设立治安模范区域,其区域范围,业已规定,先行试办者计有宛平、大兴、通县等三县”。<sup>③</sup>这样,通县不仅是新民会的模范县,也是日伪当局树立的治安模范县,号称“铜墙铁壁模范县”。<sup>④</sup>为了与“模范”名实相符,日伪当局竭尽全力加强对通县的统治力度。因此,通县是考察日伪当局对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控制的较好范本。目前学界关于新民会县级组织的研究尚属缺乏,尤其从华北沦陷区基层控制的角度对新民会县级组织进行的研究,更属空白。<sup>⑤</sup>本文主要利用北京市通州区档案馆所藏之档案资料,从组织控制、思想控制、民意运作、乡村控制等方面分析通县新民会的相关活动,藉此考察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基层社会控制之实态。

### 一、“模范会”:通县新民会与各分会

日伪当局认为,“组织愈多,每一个人所属的关系网亦愈多,而加到每一个人身上的约束力也越大,愈使他不容易作奸犯科”,而“中国的民众一向是没有组织的,被人称为一盘散沙”<sup>⑥</sup>,因此格外需要将其组织起来。新民会作为民众团体,最重要的职能就是通过各级会组织来控制民众。新民会中央指导部甫一成立,便积极建立各级新民会组织。

1938年6月1日,新民会通县指导部正式成立。其时,整个河北省已成立的县级指导部只有18个。其余各县由于治安尚未恢复,直至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才陆续成立指导部。至于山西、河南等省的县级新民会组织则建立得更晚。<sup>⑦</sup>根据《中华民国新民会章程》,新民会为“与政府表里一体之民众团体”。<sup>⑧</sup>为此,在组织及人事上,各级新民会会首由同级行政首脑兼任。首任新民会通县指导部部长由通县知事冉杭兼任。次年,因冉杭升任保定道指导部部长,所以通县指导部部长一职先后改由金士坚和徐葆莹继任。<sup>⑨</sup>

新民会通县指导部下设总务科和指导科,总务科掌管会计、文书、庶务等工作,科长先后由田宝严

① 《新民会河北指导部筹备事务进行经过》(1938年4月4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65册,第467页。

② 《新民会年报》(1938年度),新民会中央指导部1939年编印,第501页。

③ 《北京临时政府设立治安模范区》,《南京新报》,1938年11月13日,第2版。

④ 通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通县革命史》,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⑤ 中国学界对于新民会已有不少研究论著,(曾业英:《略论日伪新民会》,《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王强:《汉奸组织新民会》)。其中,关于县级新民会的研究,数量少且欠深入(刘殿钰:《新民会在顺义》,《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近年来日本学者菊地俊介从日伪对华北沦陷区的青年政策、女性政策等角度开展了对新民会的研究(菊地俊介「日本占领下华北における新民会の青年政策」,《现代中国研究》26号,2010年3月;菊地俊介「日本占领下华北における新民会の女性政策」,《现代中国研究》77号,2013年3月)。中外学界从基层社会控制的角度对县级新民会的研究,迄今尚无,现有的关于沦陷区基层控制的研究多集中于华中地区(曹大臣:《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以太仓县为中心(1937—1940)》,《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认为,对于新民会县级组织及华北沦陷区基层控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⑥ 《新民会分会与民众自卫》,原件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特藏阅览室,编者及出版信息不详,第7—8页。

⑦ 王强:《汉奸组织新民会》,第45—50页。

⑧ 《中华民国新民会章程》,《新民会报》第一号,1938年4月1日,第3页。

⑨ 《关于调委徐葆莹署理通县知事的公函》(1943年12月31日),北京市通州区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102/12/571,第142页。按,下文引用之通州区档案馆所藏之旧政权档案,一律简称“通档”。

和日本人中村义照、角田正夫担任。<sup>①</sup> 指导科掌管宣传教化、训练青年诸事,科长一职由中国人张致平担任。<sup>②</sup> 1940年3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并入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与此相适应,新民会各级机构也进行了改组。以通县为例,新民会通县指导部被改组为新民会通县总会,总会下辖事务局,作为处理日常会务之中枢。事务局设局长、次长各一人,局长由县知事兼任,次长由日本人角田正夫担任。<sup>③</sup> 县知事虽同时兼任新民会会长和事务局长职务,但据时人回忆,“会长只是虚名,不负任何责任,只是开大会时通知他出席参加,也只是听会,不表示任何意见,次长掌握一切”<sup>④</sup>,故实际会务由角田正夫把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越来越多的日籍会务职员被抽调至太平洋战场。同时,华北作为日军兵站基地的地位日益突出。为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竭尽全力加强扶植新民会”,改革新民会的各级机构,使“新民会为彻底的中华民国新民会,绝不可以成为日本人的新民会”。<sup>⑤</sup> 在通县,事务局被改组为事务部,原来之事务局局长和次长均被撤销,设部长一人总理会务,以加强一元化的领导。事务部部长一职先后由常绪坤和李善承担任,强化了华方对会务的影响。<sup>⑥</sup> 其次,日籍职员由于数量锐减,改从台前退至幕后,以参事身份指导会务。<sup>⑦</sup> 其三,原来由县政府负责的武装自卫和保甲训练事项改由新民会办理,标志着新民会“从思想团体向政治团体演变”。<sup>⑧</sup> 为此,事务部下辖的机构也进行了改革,由原有的总务、指导二科增为三科。第一科负责宣传教化,第二科负责农村武装自卫,第三科负责会计、文书等庶务,职能日益扩张,分工渐趋细化。<sup>⑨</sup>

分会是新民会的基本组织,凡新民会会员必须属于某一分会。通县新民会成立之后便积极成立分会,藉由分会来控制民众。在农村,新民会以大乡为单位成立农村分会。分会之下,又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村支会,将村民组织起来。在县城,通县新民会以职业别成立教育分会、职员分会、体育协会、中西医职业分会及商业分会。<sup>⑩</sup> 相较其他县级指导部,如同样位于京郊的怀柔县直至1940年4月才组织了教育分会和商业分会<sup>⑪</sup>,乐亭县指导部直至1939年5月亦仅有教育分会之设<sup>⑫</sup>,通县指导部在组织分会方面无疑走在前列。

以通县教育分会为例,该会成立于1938年10月27日,“以信仰新民主主义、发扬民众精神、彻底努力剿共灭党之工作,而谋国家复兴、中日满永久亲善、共同发展地方教育为宗旨”。教育分会的主要职能包括“地方教育之研究设计及改进事项,地方教育之调查统计及编撰事项,举办各项研究会及学术讲演会,会员之心身训练及陶冶事项,办理评议及合议事项,会员公众福利事项,会员之征集及组织等事项,办理关于通县指导部交办事项,办理关于联合协议会之决定事项”。<sup>⑬</sup> 由此可见,教育分会兼有教学研究的学术社团和教师行会的双重性质。

通县教育分会共有会员41人,其中通县公署主管教育行政的官员5人,学校校长及教导主任

① 《通县新民会体育协会职员名册》(1938年11月),通档,102/12/270,第52页。

② 《关于奉令变更机构的函》(1939年3月2日),通档,102/12/347,第1页。

③ 《关于改组的函》(1940年4月9日),通档,102/12/424,第7页。

④ 徐白:《沦陷时期的通县人民惨遭蹂躏》,《文史选刊》1995年第15期,第8页。

⑤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⑥ 《关于报送1944年度县联议案处理经过调查表的公函》(1944年10月),通档,102/12/599,第25页。

⑦ Akira Iriye, "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 The Hsin-Min Hui",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73.

⑧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52页。

⑨ 徐白:《沦陷时期的通县人民惨遭蹂躏》,《文史选刊》第15期,第8页。

⑩ 《关于庆祝孔子诞辰的函》(1940年9月21日),通档,102/12/441,第6页。

⑪ 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河北省怀柔县事情》,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0年版,第19页。

⑫ 陈佩编辑:《河北省乐亭县事情调查》,新民会中央指导部出版部1939年版,第16页。

⑬ 《教育分会章程》(1938年11月),通档,102/12/347,第70—72页。

20人,普通教师16人。校领导(校长和教导主任)占会员总数的49%,成为会员主体。他们既是实际教学政策的主导者,又活跃于教育的第一线,能接触到大量师生,是教育界的中坚力量。此外,这些会员在当时均为高学历者,中等专科学校学历者28人,占68%,大学本科学历者13人,占32%。<sup>①</sup>结合当时民众受教育的平均程度,这批人堪称名符其实的地方精英。新民会便这样通过教育分会将通县教育界精英悉数网罗。教育分会的情形如此,其他职业分会当大抵如此,即各按职业组成分会,吸纳业界精英,接受新民会的指导。通过分会,新民会把各行业、各地区的人民控制起来。

新民会认为,一种组织,除了在消极方面能对人加以约束,“在积极方面,只要团体组成的意见一致,‘众志成城’,什么都可以作[做]的成”。<sup>②</sup>然而,新民会会员多而滥,要想达到“众志成城”的目的并不容易。据时人回忆,早期加入新民会要办理一定的手续。后来,会员“发展工作‘突飞猛进’,手续也不那么完备了,许多人糊里糊涂成了新民会会员”。<sup>③</sup>至1942年8月,新民会最高顾问铃木美通称,“现在约有350万会员,将来准备将华北的全部居民都吸收进来”。<sup>④</sup>在此方针指导下,至1944年5月,新民会已吸收了1000万会员,约占华北总人口的1/10。<sup>⑤</sup>庞大的组织下,滥竽充数为常态。以职员分会为例,该会由通县境内的公务员组成。分会之下以各机关为单位成立支会,支会会长由该机关的长官担任。为了“振发会员精神”,该分会规定每星期举行朝会一次。然而,会员多不能按时参加朝会,于是职员分会只好派人“劝说”会员每周按时参加朝会。<sup>⑥</sup>职员分会的会员作为公职人员,理应为诸分会树立表率,尚且如此散漫,更无论其他分会。如果缺乏严格的纪律性,新民会的组织只能徒具形式,并不能真正约束和控制会员。1945年8月,随着日军战败投降,通县新民会各级组织很快瓦解,职员亦自行解散。

## 二、“思想战”:新民主主义宣传与青年训练

新民会的主要任务是与国共两党进行“思想战”,即通过控制沦陷区人民的思想来磨灭其反抗意志。对此,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素有新民会理论领袖之称的缪斌<sup>⑦</sup>谈道:“此次事变,使用武力是不得已的事体。事变之后应当赶快用道义感化人民,使人民自动地来解决此次事变,新民会便是负有此种使命的。”<sup>⑧</sup>缪斌所指的感化人民的“道义”,具体说来,就是新民主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产生的最初动因是日本的一些思想家如谷口吉彦等人,急于为日军的侵略战争提供合法性证明。其理论框架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即将走向灭亡,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的目的是用东方文化道德取代已经失去信用的西方政治和文化秩序,即建立东方文化新秩序,达到复兴亚洲的目的。<sup>⑨</sup> 缪

① 《新民会通县教育分会会员简明履历表》(1938年11月16日),通档,102/12/270,第18—24页。

② 《新民会分会与民众自卫》,第10页。

③ 果勇:《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240页。

⑤ 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页。

⑥ 《职员分会改组筹备会记录》(1940年6月13日),通档,102/12/441,第54页。

⑦ 缪斌(1902—1946),早年参加国民革命,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北伐结束后,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抗战爆发后叛变投敌,任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著有《新民主主义》一书,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被日本人视为中国方面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领袖。参见 Akira Iriye, “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 The Hsin-Min Hui”,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p. 259—261.

⑧ 缪斌:《缪中央指导部部长之开会辞》(1939年10月3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6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页。

⑨ Akira Iriye, “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 The Hsin-Min Hui”,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p. 255—256.

斌随后利用中国典籍中的“王道主义”和“克己复礼”等思想对此加以阐释,于1938年1月出版《新民主主义》一书,从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缪斌在该书中说,“优者善者生存,劣者恶者败亡”,故“战争者,正欲使不平者平,不和者和耳”<sup>①</sup>,将日本的侵略战争解释成替天行道,为日军的侵略战争辩白。社会控制理论认为,高超的控制方法是精神上的。<sup>②</sup>新民主主义披着东方传统文化的外衣,对中国人的思想施以潜移默化之奴化影响,确实是一种事半功倍的控制手段。

通县新民会为宣传新民主主义,与国共两党进行“思想战”,采用了五花八门的方式,如派销《新民周刊》《新民报》等刊物,要求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一律必须订阅,不得藉词拒受”。<sup>③</sup>作为新民会重点教化对象之学校,则被要求开设“新民课程”,每周一小时,由通县新民会的职员担任讲授,以利学生彻底明了新民主主义。在连续讲授两个月后,新民会认为学生对于“新民奥义已有相当之了解,故关于前项课程,拟暂行终止讲授”。<sup>④</sup>除了口头讲授,通县新民会还发大量的宣传品给各校,如《新秩序》《新中国》《新民会大纲》等。<sup>⑤</sup>

高压政权之“思想战”往往软硬兼施,除了正面宣传新民主主义以外,对涉及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及抗日思想的书籍亦厉行查禁。1938年初,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员泷本治郎视察弘达中学,发现该校图书室有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抗日书籍。嗣后,新民会中央认为“其他多数学校之图书室中应尚存有此等书籍,亦未可知”,要求各校“严加检查,扫除毁弃”。<sup>⑥</sup>没过多久,又认为抗日书籍若由各校自行焚毁,“难免混淆,以致有不统一之弊,而阳奉阴违,私自储藏,未加焚毁者亦实有之”<sup>⑦</sup>,故要求各校将所藏之反动书籍交由当地新民会处理,由新民会将书名上报中央指导部。随后,新民会中央指导部就各地呈缴上来的图书进行汇总,择出部分制成禁书目录。<sup>⑧</sup>

1938年9月,河北省立第一新民教育馆向新民会通县指导部呈缴304本“禁书”。这些图书涵盖了政治、历史、中小学教材等各种类型。其中一部分确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等国民党读物、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社会主义图书和《1936》这样的反日书籍,然而连《书信作法》和《皮肤病的预防及治疗》这样的图书也被作为反动读物加以查禁,实让人莫名其妙。<sup>⑨</sup>这300余本“禁书”中的绝大部分并未出现在新民会中央指导部于稍后整理出版的禁书目录中,仅有31本被列入该禁书目录,也就是说通县查禁的这批图书只有10%被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认可。出现这种现象,不外乎两种原因:一则新民会明令各校“如已遵前令毁弃在先,以后不得再有发现,一经查出,应由各校主任人员负责”。<sup>⑩</sup>学校方面迫于高压,战战兢兢,唯恐有漏网之鱼,不管是不是反动读物,一律上缴,以免后患。二则通县自1933年被划入冀东非武装区,较早成为日本染指之地,其有关国共两党及反日图书,比之其他地区为少,亦在情理之中。

然而,通县新民会仍不放心,于1939年6月指示各校“如仍有蕴含抗日意味之书籍,即速缴送于

① 缪斌:《新民主主义》,中华民国新民会出版部1938年版,第1—2页。

② E. A. 罗斯:《社会控制》,第325页。

③ 《关于派销订阅〈新民报〉的函》(1938年9月8日),通档,102/14/69,第8页。

④ 《关于终止讲授新民要义课程的函》(1938年11月14日),通档,102/14/69,第24页。

⑤ 《关于送发宣传品的函》(1939年8月3日),通档,102/12/347,第18页。

⑥ 《关于毁弃反日书籍的训令》(1938年5月21日),通档,102/12/272,第5页。

⑦ 《关于毁弃反日书籍的代电》(1938年9月15日),通档,102/12/272,第29页。

⑧ 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于1939年根据各地查禁的图书,先后编成《禁止图书目录·抗日之部》(1939年)、《禁止图书目录·社会主义之部》(1939年)、《国民党关系图书目录》(1939年)。通县所查禁的304本图书只有31本被列入以上三本禁书目录之中。

⑨ 《河北省立第一新民教育馆检出书目一览表》(1938年9月16日),通档,102/12/272,第36—65页。

⑩ 《关于收缴抗日书籍的训令》(1938年5月31日),通档,102/12/272,第21页。

敝部”。<sup>①</sup> 于是,河北省立第一新民教育馆又将《留东外史》及《丁玲文选》等 23 册图书交给新民会通县指导部。表 1 为此次上缴之图书目录,其中除《丁玲文选》《留东外史》因有反日内容而被新民会中央指导部列入禁书目录外,其余书籍多为奇侠怪谈之小说类,难以达到日伪所谓“反动图书”的标准。

表 1 1939 年 7 月河北省立第一新民教育馆检出书籍数量表

书名	著者	出版社	书名	著者	出版社
南北异人传	张个依	上海南方书店	家庭小说集	徐卓呆等	大东书局
满城风雨	张恨水	上海大名书局	天台奇侠传	蔡陆山	新亚书局
留东外史	不肖生	大东书局	酱色的心	陈启修	乐群书店
儿童谈话	徐蘧轩	世界书局	欧美透视	詹文浒	世界书局
丁玲文选	丁玲	上海仿古书局	荒唐梦	骆无涯	玫瑰书店
课程标准	教育部	百城书局	湖上的悲剧	田汉	
洪秀全		大达书社	滑稽小说大全	赵茗狂	

资料来源:《河北省立第一新民教育馆检出书籍数量表》(1939 年 7 月 4 日),通档,102/12/347,第 26—27 页。

新民会之思想战的主要目标是青年。青年人血气方刚,人格思想的可塑性强,历来是各党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从社会控制的效果来看,“培养教育青年人这样的有远见的政策就优于对成年人的即时管理”。<sup>②</sup> 七七事变以后,华北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爱国心切,不愿在伪政府下就学,多随学校内迁,导致沦陷区学校大量停办,生源锐减。这样的客观情势也迫使新民会必须立即对青年展开思想工作,清除其爱国思想。

为教化青年,各级新民会均成立青年训练所,自诩“凡有指导部之省道县,均有训练所之设”<sup>③</sup>,足以证明其对青年的重视程度。通县青年训练所成立于 1938 年 8 月。从 1938 年至 1940 年,通县先后训练了七期青年训练生,每期培训时间约两个月。<sup>④</sup> 这些青年训练生受训的内容包括学科、劳作和军事三科。学科即意识形态和行政能力训练,劳作即农业生产劳动,军事指军事训练。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找到通县青年训练所培训课程的相关资料,现综合通县近旁之各县情况,以作参考。表 2 为怀柔县青年训练所的课时表。

表 2 新民会怀柔县总会青年训练所课时表

课目	课时(时)	在总课时中所占比重(%)
学科:(新民主主义、新民精神、中日满不可分离关系、防共要义、县政大观、乡村自治问题、日语、县财政、县教育、警察与民众、农业概要、卫生)	234	37.5
劳作	273	43.75
军事	117	18.75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河北省怀柔县事情》,第 20 页。

① 《关于抗日书籍搜集送缴的函》(1939 年 6 月 27 日),通档,102/12/347,第 20 页。

② E. A. 罗斯:《社会控制》,第 325 页。

③ 陈佩编辑:《河北省乐亭县事情调查》,第 25 页。

④ 《关于举行青训生入所式的函》(1940 年 4 月 12 日),通档,102/12/441,第 14 页。

由表2可见,学科的具体科目既有“新民主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课程,又有“县政大观”“县财政”这样的行政训练课程。至于学科、劳作和军事三大科目的主次轻重,表2显示,学科课时所占比重为37.5%,劳作占43.75%,军事占18.75%。因此,怀柔县青训所以学科和劳作并重,以军事训练为次要。乐亭县与通县同属冀东道,乐亭青年训练所“以精神训练、勤劳奉仕、农村训练为主要,自卫训练为次要”<sup>①</sup>,同样也更重视学科和劳作。此外,唐山市青年训练所同样也以学科和劳作为主要训练内容。<sup>②</sup>以上三地均注重精神塑造和农业技能的提高,而将军事训练置于次要地位,通县的情形也许与这些地方出入不大。揆其原因,人所受训的青年大多来自农村,培训目标是“坚强其爱乡自治观念,而作乡村之中坚指导者”<sup>③</sup>,即培养农村基层行政人员。于是,行政能力和农业生产技能的训练,成为该项培训的题中之义。这些青年随后成为各地新民青年团和新民合作社的骨干。<sup>④</sup>

新民会对思想的控制可谓从外到内,软硬兼施,既注重道义之感化,又实行高压钳制,尤其注意对青年进行思想塑造。那么,其控制效果如何?入江昭对新民主主义曾如是评价:“最终说来,再多的政治宣传也不及日军在中国的实际行动重要。”<sup>⑤</sup>当时的通县群众也回忆说,新民会“在理论上越来越破绽百出”,在群众中的形象极坏。<sup>⑥</sup>一切正如孔子所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已属极为不仁之举,宣传教化手段再好也只是徒具形式,并不能发挥作用。对此,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森冈皋少将承认,“大部分与实践不相适应的思想运动均成泡影。军方本来着重致力于精神方面的培育,但其结局,虽强行灌输占领军所赶制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却非当地民众所能接受”。<sup>⑦</sup>

### 三、假造民意:新民会联合协议会

伪政权向无民意机构,为点缀门庭,日伪当局于各级新民会附设联合协议会(以下简称“联协”),作为“畅达民情、宣布上意”<sup>⑧</sup>的民意机关,借以把握民心。

关于联协的作用和地位,新民会中央总会顾问安藤纪三郎曾谈到:“民众对于分会之信仰,自然以代表分会综合意志之机关,即联协之活动如何为转移”。<sup>⑨</sup>可见,联协的活动关乎民心向背,是日伪当局控制民意的重要工具。通过考察通县联协的运作可知,联协正如时人所回忆的那样,“专为日伪歌功颂德,把日伪的要求用欺骗加命令的方式强加于民众”<sup>⑩</sup>,是一个假民意机关,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

通县新民会从1941年至1944年每年都举行联合协议会。1942年初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加

① 陈佩编辑:《河北省乐亭县事情调查》,第26页。

② 《唐山市青年训练所训练细目》(1940年4月),张洪祥:《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69页。

③ 陈佩编辑:《河北省乐亭县事情调查》,第26页。

④ Akira Iriye, "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 The Hsin-Min Hui",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p. 268 - 269.

⑤ Akira Iriye, "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 The Hsin-Min Hui",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 269.

⑥ 马汝良:《通县新民会》,通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烽火通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194页。

⑧ 《新民会联合协议会规则》(1940年5月15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6卷,第409页。

⑨ 《安藤纪三郎谈伪新民会1940年工作重点》(1940年8月20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6卷,第413页。

⑩ 果勇:《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281页。

开了一次临时联合协议会,故共举办了五届。笔者查阅档案资料,仅见1942年初通县临时联协及1944年度联协的相关档案,今权且以此为参考,初步考察联协的民意运作。根据会章,县联合协议会之候选代表由各分会自行选出,再由新民会委员会从这些候选人中“衡论推荐”,由县总会会长正式任命。<sup>①</sup>由此可知,代表并非完全由民选产生,新民会在其中具有相当大的操作空间。仅就这一点看,联协的民主性即须打折扣。那么,新民会精心圈定的这些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呢?表3是通县1944年度联合协议会的代表构成。

表3 新民会1944年度通县联合协议会代表构成表

职业		人数	比重(%)	年龄	人数	比重(%)	所属分会	人数	比重(%)
校长		3	8	20—30岁	8	22	职业分会 (县城)	12	32
医生		1	3	30—40岁	2	5			
商人		8	22	40—50岁	15	41			
官员		12	32	50—60岁	10	27	地区分会 (乡村)	25	68
农民	新民会普通会员	2	35	60—70岁	2	5			
	农村分会会长	11							

资料来源:《1944年度通县联合协议会代表名簿》,通档,102/12/599,第40—44页。

1944年度联协共有代表37人。由表3可见,代表由农村分会代表及县城职业分会代表两大部分组成,范围横跨城乡。代表年龄从20岁至60岁不等,平均年龄43岁。其中,40岁至50岁这个年龄段的代表占据主流,这些人正值年富力强,是各行业的当权群体。从职业构成来看,代表中既有官员、农民,也有商人、校长和医生,几乎涵盖了士农工商各阶层。其中,农民代表所占比重最大(35%),这也契合当时华北地区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然而,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农民当中有11人担任新民会乡分会会长一职。由于新民会各级会长由同级行政长官兼任,故上述之11人或许同时兼任乡公所的职务,属于领薪人员,因而不能将其等同于体制外的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表3中仅有两个农民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即便如此,也不能贸然将这二人等同于下地劳动的农民。抗战期间,由于日军搜刮太甚,摊款过重,许多富有的乡绅为了躲避征收摊款之苦差而主动退出乡村政权。<sup>②</sup>表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农民”也许系退隐之乡绅地主,亦未可知。尽管表3中的“农民”代表之经济地位尚不能确定,但官员、商人、校长、医生等通县中上阶层加起来已占代表总数的65%,构成了这届联协代表的主体。显然,这些中上阶层并不能代表占据总人口之多数的下层百姓的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值得怀疑。

由这些代表组成的联协,其讨论的事项有哪些?1942年临时联协之议案内容全部与战争有关,包括“请通电表示通县四十万民众誓作大东亚战争之后盾案”“请收集废金属品以便呈献军方案”“募集慰问袋送往前方慰劳皇军案”等。<sup>③</sup>上述之清一色的支援战争之议案,说明这届联协的提案范围被严格限定为与太平洋战争有关的内容。事实上,联协开会之前,通县新民会在会议通知里就预先设定了会议主题,即“将政府当局策应大东亚战争之方针下达于民众,及阐明华北民众之

① 《新民会联合协议会规则》(1940年5月15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6卷,第410页。

②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183页。

③ 《新民会临时通县联合协议会记录》(1942年3月9日),通档,102/12/534,第8—10页。

意志与任务”。<sup>①</sup> 面对命题作文,这些御用民意代表恐怕很难拂逆上意,只得投其所好,鼓吹通县民众参战的决心。

表4 新民会1944年度通县联合协议会议案表

已解决之议案		
议案号	件名	解决办法
1	请将杂役亩捐明令划归产权人负担案	亩捐业已明定由产权人负担,至杂役应遵循私人契约
2	请改正杂役责任量及棉花供出量收买办法,以昭公允案	本年度视收获量之多寡及灾情之有无再决定供出之数量
3	为偏僻之村落组织武装支队以维治安案	应向县联庄会请求办理
4	请发放三间房飞机场被占地亩补偿金案	县府绝本困难情形,向上方请求
5	请核减三间房飞机场被占地之各村捐税	该区呈报占地数额,由县府呈请核减
6	请令全县负担建设三间房飞机场之所需物资以昭公允案	由县府统筹办理
7	为警备公路理应制止铁轮大车行走,以免轧毁路面案	警所已通令各分所,遇有轧毁情形,严为处罚
8	请豁免警备路所占民地之田赋亩捐案	省联已决,令各县报告被占地亩数
9	请在北门外设立派出所,以维治安案	视需要情形再行设法尽力办理
10	为县城内情形特殊,请免摊款案	按原案办理
11	请于各乡镇设立高级小学案	由县府呈请省府办理
12	为肃正思想恳请成立巡回文库案	由省教育馆负责办理
移任之议案		
13	为请求取缔白面馆,以靖地方案	由县总会函县政府办理
14	令民众在凉水河两岸开渠种麦以增产案	由县总会函请县府合作社调查办理
15	大东亚战争决胜之年应厉行军事教育案	由县总会对青少年团加强训练
16	停止配给学生以玉米而于教职员增加配给案	由县总会函合作社查照办理
17	为各区供应岁给之土地数目今昔不同,请参酌各区地亩数目另定摊款成分案	由县总会函县政府办理
18	为潞潞河沙地瘠土不毛,请豁免亩捐案	由县总会函请县政府办理
19	为街头摊贩亦应负担摊款以昭公允案	由商会拟定负担办法转呈县府审核

资料来源:《民国三十三年通县联合协议会解决议案处理经过状况调查表》(1944年10月),通档,102/12/599,第32—34页;《新民会民国三十三年度通县联合协议会移任委员会议案处理经过状况调查表》(1944年10月),通档,102/12/599,第35页。

<sup>①</sup> 《关于举行本县联合协议会的函》(1942年1月29日),通档,102/12/534,第1页。

相比为参战而特意举行的临时联合协议会,通县 1944 年度联协之议案内容更广泛,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更便于考察联协的议事过程。表 4 为该年度之议案表。由表 4 可知,该届联协的议案处理办法大致有二:一为当场议决,一为议而不决。其中,4 号、5 号、6 号、7 号、8 号议案,大多涉及日军修建三间房飞机场及警备公路给予百姓的经济补偿<sup>①</sup>,关乎民生,切中时弊。其所以能当场议决,是因为县政府等行政机关已有解决方案,故联协给以“县府绝对负责”“县府统筹办理”等明确答复。

另一类议案,即议而不决的议案,则被移至新民会通县委员会进行不公开、不透明的内部表决。新民会通县委员会如同联合协议会一样,附设于各级新民会总会,由府会双方之少数要人组成。根据表 4,被移任的议案一共 7 件,几占该年度议案总数(19 件)之半。这些议案为何没有当场议决,而被新民会弃置于委员会呢?

由表 4 可知,这些议案大多涉及敏感利益,新民会无力也无意介入这类棘手事务。例如 13 号议案请求取缔白面馆,白面馆系鸦片烟馆俗称,又称“膏店”。抗战期间,通州城遍布鸦片烟馆。据通县居民回忆,“城内外膏店有五、六家之多”。日本人“为了消除中国人的反抗意志,给一切‘不良嗜好’开方便之门……欲使之成为‘顺民’,先使之成为‘烟民’”。<sup>②</sup>因此,取缔鸦片烟馆显然不可能。而且,由于日伪当局名义上一直有禁毒之倡,故新民会亦不便当场否决这个议案。于是只好踢皮球,将议案移至委员会,嗣后委员会答以“由县总会函县政府办理”,该案便不了了之。再如 17 号议案,该案提议重新划定各区摊款比例。各区摊款早有定数,此番提议重划比例,牵涉各方利益,远非新民会所能解决。于是,该案同样被答以“由县总会函县政府办理”,却没制定出相应的分摊方案,显系虚与委蛇之法。联协通过“移任”的方式,获得了对表决结果的操纵空间。对于县政府能办的议案,联协当场予以通过。对于县府不能办而又不便当场否决的议案,则将其移任至委员会,最后虚与委蛇了事,而这一切均以民意的名义进行。

由上观之,联协代表之产出,联协提案之范围,以及议案的表决过程均被新民会操纵起来。联协之运作既不公开透明,也不民主。所谓“正当之民意”通过这种方式被精心制造出来,为伪府点缀门庭。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当局控制力度之强弱往往以社会之需要为转移。如果社会秩序的维持较容易,社会控制就较为宽松,人民也将得到更多自由。反之,“如果社会秩序的维持困难,更多更好的控制手段就是社会所需要的”。<sup>③</sup>因此,联协侵夺民权、假造民意,从侧面反映了沦陷区基层社会的失序及伪政权的无力。控制的加强,意味着沦陷区人民自由的减少。最终,这种过度的控制将加剧人民与伪政府间的对抗程度,从而影响伪政府的统治秩序。联协对民意的控制,非但难以增进民众对日伪当局的支持,反而由于其虚伪性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痛恨与抵制”<sup>④</sup>,这必然影响日伪当局的控制效果。

#### 四、乡村控制:新民会与保甲连坐及武装自卫

抗战期间,战争的巨大物资消耗使得日伪当局必须加强社会榨取,以维持战争机器之运转。这就要求伪政权将政治权力进一步深入乡村,以利搜刮事项之进行。为此,日伪在华北推行大乡制,

<sup>①</sup> 按,1942 年春,日军在通县三间房修建飞机场,征用民田 20 余顷,参见张向群《通县人民抗日大事记》,《文史选刊》1995 年第 15 期,第 43 页。

<sup>②</sup> 朱向如:《我的童年回忆》,《文史选刊》1995 年第 15 期,第 27 页。

<sup>③</sup> E. A. 罗斯:《社会控制》,第 302 页。

<sup>④</sup> 马汝良:《通县新民会》,北京市通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烽火通州》,第 94 页。

以大乡作为伪政府之行政末梢,以加强对乡村的政治控制。此外,华北日伪当局还面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严峻挑战。中共抗日武装在1938年冀东大暴动失败之后,并未一蹶不振,而是蓄势待发。据日本华北方面军掌握的情报,1939年底,连通县这样靠近北平的地区也有中共组织渗入民间。<sup>①</sup>至1940年,通县东部成为中共蓟宝三联合县第四区的辖区。<sup>②</sup>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光靠大乡政权显然不足以对付中共领导的抗日势力,乡村社会的秩序亦难以维持,这就要求日伪通过其他方式强化对基层的控制。

日伪当局认为,“由政府所办的事情,每每到了乡下之后,不是变了本质,就是敷衍了事,很少能发挥实际效果。所以若打算使一种制度能够切实地实行,则除了政府的命令之外,必须另外有一种推动的机能。新民会的乡村分会,正好合乎这种理想”。<sup>③</sup>基于这种考虑,新民会农村分会便作为协助乡公所加强社会控制的工具,围绕推行保甲和武装自卫两大任务<sup>④</sup>,以大乡为单位在华北各地纷纷建立起来。为节省行政开支及各项工作推行之便利起见,新民会乡分会与乡公所合并设置,分会长由乡长兼任。分会之下,以自然村为单位设立村支会。支会长初由村长兼任。保甲制实行之后,由于村长改为保长或联保主任,于是支会长也就由保长或联保主任兼任。

新民会推行保甲制,主要是看重其人身控制的作用,即通过将人民编入保甲,实行连坐制,而使人民互相监视。通县作为日伪的模范县,率先于1938年11月试行保甲制。10户1甲,10甲1保,一般以一自然村为一保,如该村太大则编为数保,称联保。由于保甲制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保长队伍的素质,因此有必要首先对通县的乡保群体进行考察。这一时期的通县档案中充斥着大量的乡保长的辞呈。乡长在当时已是伪政权的正式行政人员,保长虽不是正式人员,但也有一定之薪水。<sup>⑤</sup>即使出于谋生的角度,乡保长亦不至于辞职。那么,这些乡保长纷纷辞职,究为何故?1943年4月,通县水牛房村保长兼新民会支会长董书庭向大乡长递交辞呈:

村民董书庭于去年10月间蒙贵乡长之指派,充当本村保长。敝人自愧才薄学浅,缪蒙重寄。自接事以来,数月之间,对于公务多有贻误之处。幸蒙各方长官未加深责,思之不胜感激,惶恐之至。长此以往,倘若贻误要公,敝人实难负此重责。也兼之敝人家道中落,度日维艰,在此薪桂米珠之际,实难株守家乡,坐以待毙。故于不得已之中正在托人谋事。倘若仓促外出,无人负责,与其贻误要务于后,何若辞退于事先。<sup>⑥</sup>

这段文字透露几个信息,其一,董担任保长系由乡长指派,非其本人自愿,也非由民选产生,说明这时人们多不愿意充任保长。其二,董称其家道中落,度日维艰,正在托人谋事,这说明董的家境

<sup>①</sup>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126页。

<sup>②</sup> 通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通县革命史》,第75页。

<sup>③</sup> 《新民会分会与民众自卫》,第13页。

<sup>④</sup> 按,自1942年初华北合作事业总会成立之后,原由新民会办理的合作社业务统由华北合作事业总会接管,故本文未将合作社纳入研究范围。参见王士花《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合作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1期。

<sup>⑤</sup> 朱德新:《乡村基层政权》,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sup>⑥</sup> 《关于请求辞职的呈》(1943年4月19日),通档,102/9/129,第7页。

并不富裕。笔者通过查阅当时通县政府的地亩册,发现大羊坊乡保长平均拥有地产 12.6 亩。<sup>①</sup> 以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来看,12.6 亩属于中等以下。由此观之,董的情况并非个例,而是当时之普遍情形,即通县的保长群体并非乡村富户,而是中下人家。<sup>②</sup>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形,原因之一在于抗战期间日伪为了以战养战而搜刮太甚,导致富有乡绅主动逃离乡保政权。这一时期乡公所和新民会乡分会的议事内容几为征收摊款所充斥。1943 年 5 月的新民会通县总会区委员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征收乡青年训练所的口粮和制服费。<sup>③</sup> 1944 年 8 月的双树乡乡务会议也围绕征收军警援护委员会的摊款、替燕京道保安队征募 8 名新兵、征收乡公所职员口粮等搜刮事项而展开。<sup>④</sup> 过重的搜刮导致直接负责向所在村庄征收摊款的乡保长吃力不讨好,“因而上层视当乡保长为畏途(挨打的架子),多雇流氓或穷人充当之”。<sup>⑤</sup> 由这样一支脆弱的、不安于位的保长队伍领导的保甲制,其控制机能可想而知。

虽然保长纷纷联名具保,称“村中虽一童叟俱按名口注入户口册,均身家清白良善百姓,为此民村等敢具确实甘结,倘有隐匿不报之情形,以后查出,民等全村愿以身家性命担负全责”<sup>⑥</sup>,然而中共势力仍然深入通县乡村。在 1941 年至 1942 年日伪统治秩序最稳定的时期,中共统战工作仍暗地进行,积极争取乡保长、小学教师的支持,并派人直接打入伪乡公所,化日伪政权为两面政权。通县东部地区至 1943 年已成为中共平三蓟联合县十区的辖区,向中共完粮纳税。<sup>⑦</sup>

乡保政权的两面化,说明新民会推行的保甲制的控制效果并不理想,不但没能制人,反为人所制。但若完全将日伪对乡村控制的不力归结到保甲制身上,也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对日伪来说,由新民会主导的乡村控制除了保甲制之外,还有武装自卫。通县是“模范县”,属于日军划定的“治安区”。由于日军被大量调至非治安区用于清剿中共武装,故治安区的防务主要由伪军及民间武装维持。通县的民间武装因而较之其他地区,格外发达。新民会在通县先后成立的民间武装有武装自卫团和保甲自卫团。

武装自卫团,又名“政治工作队”或“新民联武队”,是职业性武装,由通县公署发给枪支并每人

① 表 5 新民会大羊坊乡分会 1942 年度支会会长地产表

村别	支会会长	拥有土地(亩)	村别	支会会长	拥有土地(亩)
郑庄村	李洪恩	10	水牛房	何凤信	10.5
				董树棠(1939 年在任)	12.5
北神树	党文和	9	马家湾	赵德元	4
董村	谢铨	16	康村	吕庶卿	26
人均地产	12.6				

资料来源:《通县大羊坊乡地亩册》,通档,102/8/121,第 1—58 页。

② 关于抗战期间华北乡保群体的经济状况,朱德新与杜赞奇等学者均持相似看法。根据朱德新在冀东农村的采访调查,三十年代基层农村行政人员具有三个特点,即“1. 中等阶层偏下;2. 能说会道;3. 为生计而参加”。参见朱德新《乡村基层政权》,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第 96 页。杜赞奇认为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过重的摊款给乡政权带来很大负担和麻烦,导致乡村精英主动逃离乡政权,使得乡政权逐渐劣质化。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第 183 页。

③ 《新民会通县总会区委员会会议记录》(1943 年 5 月 10 日),通档,102/12/572,第 45—49 页。

④ 《双树乡乡务会议记录》(1944 年 8 月 25 日),通档,102/8/96,第 3—5 页。

⑤ 李楚离:《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为创造大块游击根据地而斗争》,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编:《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 页。

⑥ 《关于报告本村村民盲目从匪及村中现有情况的呈》(1943 年 4 月 20 日),通档,102/8/128,第 1 页。

⑦ 通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通县革命史》,第 110 页。

每月30元薪俸。团内以班为单位,每班10人至30人不等。<sup>①</sup>表6为1941年底通县武装自卫团一览表。由表6可知,1941年底,通县的武装自卫团兵力588人,470支枪,13000多粒子弹,几乎一人一枪。然而,这些枪支均系缴自民间,“多有破坏,不堪应用”。通县为此于1942年专门设立修械处,令团员将损坏的枪支送来修理,以保证战斗力。<sup>②</sup>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又将团员中吸毒者及年龄40岁以上者清理出去,实行明朗的人事制度以严定赏罚。<sup>③</sup>凡此种种,均旨在加强战力。这年8月,驻通县的日本警备队队长令新民会马驹桥地区办事处主任孙冠英挑选5名优秀的武装自卫团员,各骑自行车一辆,随同日军讨伐共军。<sup>④</sup>

表6 通县武装自卫团一览表

地区名	团员数	枪支数(支)	弹药数(粒)	地区名	团员数	枪支数(支)	弹药数(粒)
燕郊镇	33	12	360	后寨府	9	10	30
邢各庄	30	12	360	太子府	9	10	30
胡各庄	30	12	360	和合站	9	10	30
古城	30	12	360	王庄	9	10	30
式姑庄	30	12	360	张各庄	9	10	30
西焦庄	30	12	360	贾家疃	9	10	300
大兴庄	30	12	360	大豆各庄	9	10	300
梁家坟	30	30	900	大甘棠	9	10	300
小庄	20	20	600	小辛庄	9	10	300
盛屯	20	20	600	谭台	9	10	300
北杨庄	18	18	600	永乐店	17	17	500
翟里	30	30	1000	潮店	21	21	840
双埠头	10	10	300	北提寺	20	20	380
马各庄	10	10	560	东张各庄	20	20	600
草市	10	10	300	后营	20	20	1000
五里桥	10	10	300	前德仁务	20	20	510
西集镇	9	10	30				
				总计	588	470	13190

资料来源:《通县公署1940年食粮、经济、治安报告书》(1942年2月),通档,102/5/32,第13页。

除了武装自卫团,通县新民会训练的自卫武装还有保甲自卫团。通县保甲自卫团于1941年成立,以自然村为单位编成,由该村保长或联保主任领导。与武装自卫团不同,保甲自卫团不是职业性武装团体,其团员不领薪俸,凡村内的青壮年均须于农闲时轮流受训。以通县大羊坊乡为例,该乡新民会分会于1942年12月至次年1月先后分两次共抽调1112名壮丁进行训练。<sup>⑤</sup>这些人经过

① 《通县公署1940年食粮、经济、治安报告书》(1942年2月),通档,102/5/32,第13页。

② 《关于修理枪支问题的通令》(1942年8月8日),通档,102/12/534,第21页。

③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1942年10月7日),通档,102/12/534,第53页。

④ 《关于挑选青年团员随同日本警备队讨伐的密令》(1942年8月10日),通档,102/12/599,第38页。

⑤ 《通县大羊坊乡第二期青壮年受训报到册》(1943年1月27日),通档,102/8/123,第3页。

训练之后,在其所在村落巡逻放哨。各村保甲自卫团人数在 10 人至 30 人之间<sup>①</sup>,团员之多寡既取决于该村人口数量,也取决于该村拥有的枪支数量。有的村庄因为没有枪支,便没有成立保甲自卫团。至 1941 年底,通县保甲自卫团编成的情况为,永乐店地区团员 120 人,西集地区 70 人,燕郊地区 70 人,诸葛店地区 120 人,贾家疃地区 150 人,张家湾、牛堡屯、尹各庄保甲自卫团正在成立中,共计团员 530 人。<sup>②</sup> 由于日伪把从民间收缴得来的枪支优先分配给武装自卫团和青年训练所使用,余下的枪械才归保甲自卫团使用<sup>③</sup>,故保甲自卫团装备极差,不得不以木棍代替,被通县百姓戏称为“棍儿团”。<sup>④</sup>

武装自卫团和保甲自卫团在执行防务时密切配合,以武装自卫团为主力,同时轮流抽调保甲自卫团员作为辅助巡逻。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保甲自卫团负责夜间巡逻,老人妇女儿童负责日间巡逻,同时以武装自卫团所在村为枢轴村,统筹乡村自卫。<sup>⑤</sup>

通县新民会为了维持其“铜墙铁壁模范县”的招牌,对于训练民间自卫武装,不遗余力。对此,新民会中央事务总长喻熙杰在 1941 年的《新民会工作概况》中特意提及通县,称“武装自卫团,以三河县为中心,亘于通县、平谷、蓟县一带,编成为第一政治工作队及第二政治工作队,更分此为八班,与日本军及县警察队相协力,以对抗八路军,团员达数千百名”。<sup>⑥</sup> 可见,通县的武装自卫确实走在前列。事实上,它也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根据中共方面的记载,“伪‘武装自卫团’密布各村,监视并防止中共地下武装打入‘模范县’。这对开辟抗日地区造成了极大困难”。<sup>⑦</sup> 1942 年,中共在通县的游击区先后丧失。<sup>⑧</sup> 这一年新民会的工作也被该会顾问宋介褒扬为“士气最为高涨的时期”。<sup>⑨</sup>

然而,对共优势的取得主要是建立在日军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1941 年 7 月的冀东肃正作战,由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直接参与对共作战。<sup>⑩</sup>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虽然日军主力被调离华北,日伪为了维持通县治安“模范县”的声誉,仍然很重视通县的防务,驻通县的日伪军总兵力一度达到 5000 多人。<sup>⑪</sup> 随着 1943 年以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其在华北的统治也日益力不从心。“极端劣势”之新民会,在失去日军军事后盾之后,日益显出其对华北基层社会控制的乏力。1944 年 9 月,通县东部的西集镇被八路军攻克。不久,通县武装自卫团在随同日军收复西集镇的军事行动中被八路军击溃。至 1944 年底,日伪在通县的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运河以西,通县东部、南部已经被八路军收复。<sup>⑫</sup> 中共势力的扩张,说明新民会在争取民众、控制乡村等方面的失败。

战争对经济榨取的需求,以及来自中共的竞争压力,促使日伪当局加倍强化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度。然而,不顾华北农村的经济承受力的搜刮,以及侵略战争本身的非正义性,使得日伪当局

① 《剿共模范地区保甲自卫团编成清册》(1943 年 1 月),通档,102/8/123,第 7—31 页。

② 金士坚等撰修:《河北省通县志要》,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321 页。

③ 《新民会通县总会区委员会会议记录》(1943 年 5 月 10 日),通档,102/12/572,第 48—49 页。

④ 张向群、田广志:《通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事记》,《通州文史》1986 年 1 月号,第 6 页。

⑤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1942 年 10 月 7 日),通档,102/12/534,第 80 页。

⑥ 喻熙杰:《新民会工作概况》(1941 年 10 月 20 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 6 卷,第 429 页。

⑦ 通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通县革命史》,第 77 页。

⑧ 通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通县革命史》,第 82 页。

⑨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 243 页。

⑩ 通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通县革命史》,第 77 页。

⑪ 通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通县革命史》,第 89 页。

⑫ 通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通县革命史》,第 116 页。

成为最不得人心的政权。<sup>①</sup>新民会借由保甲连坐和武装自卫以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努力,除了在1941年至1942年的治安强化运动期间,依仗日军武力,得以暂时实现之外,基本上属于有心无力。诚如新民会自身意识到的,“恢复乡村治安,大队的军警固然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未必是永久的”。<sup>②</sup>新民会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乡村控制,既短暂又脆弱。

## 结 语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在《社会控制》一书中指出,“对秩序统治最严峻的考验,发生在诸如战争状态”中,这时,“秩序似乎完全是国家和法律的创造物……那里对于控制的需要是最紧迫和持续的”。<sup>③</sup>中日战争引起的巨大物资消耗,及其对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秩序的冲击,使得日伪政权不得不竭力强化社会控制来维系统治。由于县政府和乡公所的统一力不足以控制广袤的华北基层,新民会作为协助伪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应运而生。

为维持社会秩序,维护“模范县”的声名,新民会通县总会协助伪通县政府实行了多种社会控制手段,控制面从外到内、纵横结合、横跨城乡。首先,通县新民会通过外在的分会组织对会员进行人身控制。然而,由于会员杂而滥,分会组织亦欠严密,难以达到日伪期望的控制效果。其次,通县新民会还积极进行“思想战”,对人民、尤其是青年施以教化,以达到磨灭其反抗意志、实现思想控制的目的。这同样是徒劳的,新民主主义并未为普通群众所接受。此外,新民会还通过联合协议会来假造民意、控制民心。然而,联协的代表并非民选,议事过程也不透明。新民会对舆论和民意的控制愈强,人民的自由就愈少,这反过来加剧了人民对日伪当局的反感。因此,控制民意只能是自欺欺人。以上均是横向之控制。从纵向角度来说,与其说新民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不如说其重点控制地域是乡村。当时的中国乡村是伪政府权力鞭长莫及之处,更有中共势力出没其间,这对日伪的乡村统治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日伪迫切需要依靠新民会来加强控制。围绕编制保甲和武装自卫,新民会农村分会不遗余力。然而,中共力量的客观存在,以及日伪过重的搜刮,使得保甲和武装自卫的推行并不成功。此外,新民会对乡村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军强大的军事后盾。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大量撤离,沦陷区的统治秩序便难以维系。凡此种种,均导致新民会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不成功。

通过对通县新民会的考察可以得知,尽管日伪当局希望在华北基层社会实现强有力的控制,这一努力却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可谓力不从心。通县作为“模范县”,日伪尚且难以对其实现有效控制,整个华北沦陷区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之实态当不容高估。

[作者刘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莹莹)

<sup>①</sup>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204页。

<sup>②</sup> 《新民会分会与民众自卫》,第9页。

<sup>③</sup> E. A. 罗斯:《社会控制》,第2页。

#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No. 2, 2015

---

## **The Troika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otracted Resistance: Guerrilla Warfare, Base Area and Regular Army ..... *Huang Daoxuan* (4)**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CP insisted on fighting behind enemy lines,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goal of protracted resistance, and accomplished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CCP's protracted resistance behind enemy lines, guerrilla warfare, base area and regular army composed of interactive "troika," and the total war formed by unity of party, government, military and common people was the base of bases. With inter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the chain of protracted resistance was formed and operated. The success of the CCP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as a product by trial and error in practice. It did not come easy, and displayed the CCP leader's exceptional height in making strategy and policy.

## **An Abortive Mao Zedong-Chiang Kai-shek Meeting: Re-examination to the Guomintang-CCP Relations from 1942 to 1943 ..... *Jin Yilin* (23)**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entered the stage of stalemate, the Guomintang-CCP relation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cooperation to friction, and experienced the Guomintang's three anti-Communist campaigns; firstly, Shanxi New Army Incident occurred in December 1939; secondly, Southern Anhwei Incident in January 1941; thirdly, the Guomintang's preparation to strike Yan'an in May 1943. Though the CCP's party history books have many depictions to these incidents, they scarcely notice that in more than two years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ird anti-Communist campaigns, the Guomintang-CCP relations were in ease for a time, and the two parties even had closed contacts, and particularly in 1942 Chiang Kai-shek initiatively offered to meet Mao Zedong. Mao Zedong sent many telegrams to Zhou Enlai in Chongqing to talk about the matter, expecting to meet Chiang Kai-shek to discuss the Guomintang-CCP relations. Because of Zhou Enlai's objection, Mao Zedong sent Lin Biao to Chongqing to meet Chiang Kai-shek. In the end, because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two parties were sharply different, the negotiation concluded without concrete results. Soon afterwards,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mintern, the Guomintang and the CCP began a new round of confrontations.

## **An Analysis of Yamashita Tomoyuki Case—Centered on Press Reports after the Victory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Han Hua* (39)**

## **Chiang Kai-shek, Huang Fu and the Storm of the Change of Beij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Chiefs ..... *He Jiangfeng* (46)**

## **The Truth of the Grass-root Social Control in North China Japanese-occupied Areas—An Exploration to the Xinmin Society in Tong County ..... *Liu Jie* (62)**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Japanese and puppet authorities in North China established the Xinmin Society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to society and to support the puppet government to administrate. Locating in suburb of Beijing, Tong county was a model county for public order set up by Japanese and puppet authorities, and it was also a model county of the Xinmin Society. The Tong County Xinmin Society helped the puppet government to take organization control, thought

control, public opinion control and village control, and built a set of social control systems that covered inside and outside and stretched across towns and villages. However, the Xinmin Society's control to Tong county was not successful. Even the effects in Tong county, as a model county of the Japanese and puppet authorities, was not obvious, the effects of the puppet government's control to grass-root society in whole occupied areas in North China should not be overvalued.

**Difficult 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Army's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Stage of Strategic Stalemat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9 –1944** ..... *Chen Mo* (77)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nd the USA's Policies toward China, 1942 –1945**  
..... *Jia Qinhan* (93)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US government's control to public opinions, President Roosevelt established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in June 1942 to take anti-Fascism propaganda, psychological warfare to enemy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 all over the world. Until August 1945 President Truman dissolved the Office, in more than three years it presented many reports about China's resistance, making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fighting spirit, to the inspiration of fight hearts of Chinese military and common people, and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wartime relations between allied countries. The propaganda lines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to China's resistance, in particular the Office's attitude to the CCP and its armed forces directly indicated the trend of the US government's policies toward China, and revealed the substance of the USA's Far East strategy.

**Same Names, Different Substanc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unty Magistrates of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CP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Yang Dong* (108)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ough the county magistrates of the CCP and the Guomindang form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ir grass-root political power had almost historical positions, and carried great expectations of both parties, they had man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design ideas of county administrations, the two groups formed different social class frameworks; and because of different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systems, the age structure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greatly different. Looking from implementation systems of county administrations, the two groups had different working ways and styles, and the effects of administrations were quite different. The historical facets with same names but different substances and the spirit worlds with very different interests were to a great degree formed their different life tracks and life styles, and formed different political cultures, refracting the different ideological signs and symbols of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CP.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1895,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and Changes of the Sino-Foreign Treaty Relations** ..... *Li Yumin* (127)

**How to Understand Modern Japanese People's China Views** ..... *Zhuge Weidong* (148)

**New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n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A Summary of The Second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on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Pan Xun, Zhao Guozhuang, Lü Shujie* (152)

**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North China in the 1930s and 1940s"** ..... *Xu Xinge* (156)